

## 臺灣日治時代後藤新平的實業政策——手工教育的展開

楊孟哲

Gotō Shinpei's Industrial Policy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The Start of the Handicraft Education / Yang, Meng-che

### 摘要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大量派遣學者專家遠渡重洋學習西洋文化、科技及實用主義回日本，展開日本近代化的第一步。西化過程中，日本學習西方美術教育制度，將圖畫及手工教育應用在日本的國家教育中，統治台灣後，也運用於殖民地台灣的教育學制中。日本一方面以武力來鎮壓台灣的反日志士，一方面卻也教化台民，其中以伊澤修二的「有用學術論」，啟動了台灣初期美術教育的發展，對於台灣美術近代化的貢獻影響甚鉅。無論是日本皇太子來台訪問時所舉辦的教育品展覽會，或是台灣勸業博覽會、學校美術教育展覽會等，對台灣殖民地來說，是殖民文化下的特殊活動，與歐美統治亞洲殖民地有著相當不同的政策。

1898年，後藤新平擔任台灣民政局長，以利益主義為施政重點，一方面宣布統治無方針論，迴避直接宣布同化政策；另一方面，限制殖民地人民接受高等教育，因其施政重點在於對殖民地的產業開發以及人力資源的整合，所以台灣教育政策是以殖民產業中的手工教育為發展重點。本文主要在探討後藤新平以利益主義為主軸所推展的台灣手工教育之現象，並論及山本鼎來台之效應。

**關鍵字：**殖民地教育、手工教育、圖畫教育、伊澤修二、後藤新平、山本鼎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 一、後藤新平的教育政策

日本統治台灣之初，因對台灣民情、風俗、氣候和環境不夠了解與及政治立場的不同，所引發台灣人民激烈的抗日行動，遠遠超越了清朝甲午戰爭。從台灣民主國軍開始（1895年）至噶吧嘍事件（1915年），才結束長達20多年對日本的抗爭，而留下台灣人抗日的壯烈史篇，也讓日人治台之初吃盡苦頭，鑑此為鞏固殖民政權與資源的利用，日本當局更加用心收集相關台灣人文、自然……等資料，嘗試由各種角度研究台灣，亦花上許多時間研討統治政策的難題，即便如此，日本對台灣的統治初期仍施以征服壓制的手段，楊碧川《簡明臺灣史》云：

日本統治台灣最初的2年半（1895年5月～1898年2月），共歷任3位總督（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表面上由軍政轉變為民政，但實際上，3位總督為鎮壓武裝的台灣人民，用掉了龐大的行政經費（資本支出及相關計畫費用約占90%，其他10%）。日本國庫補給的16,000,000日元，都用在征服台灣和鎮壓「土匪」以建立威信。<sup>1</sup>

由此敘述可以了解日本治台初期仍以武力征服為主，直至第4任總督兒玉、後藤時期（1898年～1906年），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方式才出現了顯著的變化，此時期主要統治策略為：第一掃蕩土匪、第二財政獨立、第三理蕃政策，除以武力征服外，也企圖藉此漸進地達到其統治目的。<sup>2</sup>

在殖民過程中教育是達成統治的重要政策之一，日本治台雖然引進新式教育，讓台灣人民接觸到漢文化以外的新知識，但事實上，日本對於台灣的殖民教育是採以一種不平等的教育方針。當時殖民教育採取的是「教育應加以考究探索」之原則來進行的，即內地人之教育應適其所需，設置初等及中等教育機構，乃至於專門及高等教育。而台灣人及生蕃人的教育，則以普及國語、培養國民習性為主，致力於推展初等教育，並投注心力於國語訓練計畫、中等教育和職業教育，此方針是大正八年以來日本對台灣人新教育令頒佈之前的教育政策之依據。<sup>3</sup>日人為限制台灣人智育啟發，以順利進行統治管理，故只著重於推展初等教育，而忽視高等教育，另一方面為了殖民利益，而推行職業教育。這種以勞動為主，強調效忠日本帝國的職業教育（非腦力智商的啟發），實可稱之為愚民實業教育。

在兒玉、後藤體制下9年間對台灣的統治，除了利用鴉片增加財政收入，<sup>4</sup>對

<sup>1</sup> 楊碧川，《簡明臺灣史》，第一出版社，1987年，頁220。

<sup>2</sup> 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台灣日日新報，1927年，頁114。

<sup>3</sup> 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台灣日日新報，1927年，頁115。

<sup>4</sup> 兒玉、後藤時期，被評價為統治台灣最為成功的時期，同時也創造了統治台灣時期財政收入的奇蹟。當時為填補台灣總督府的財政漏洞，利用買賣鴉片充裕國庫。值得一提的是在兒玉、後

於殖民地教育問題，後藤新平以其特有的手段和方法推行，後藤新平於 1903 年（明治三十六年）11 月 10 日對台灣人民的教育方針下了直接性之訓示：

諸位似欲於公學校培養學者，如此則失去公學校設立最大目的，或許是本人錯誤也未嘗不知，若是錯聽訛誤則實為有幸，似又聽聞若干以實業補習學校設置之意見，而未竟公學校執行之事，若真如此則是實業學校則無需公學校之言論，本人認為此言也，實業補習學校是絕對必要。<sup>5</sup>

此時期的教育政策對往後台灣文化教育產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響，甚至成為台灣實業教育之先驅。

然而在日本殖民台灣的官僚體系中並非全是無理想主義者，仍有部分日本教育者持著高度熱忱，如時任教務科長的木村匡<sup>6</sup>，在職期間曾主張設立高等學府（大學），但並未得到後藤的支持，而當時在台灣小公學校校長會議也曾多次提議增設台灣師範學校以及高等學府，讓台人享有較高的教育機會。而後藤則認為，島民的教育只限於初等教育的水準，何須高等學府。後藤總是獨排眾議，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政策背書，基本上後藤是以美國名著《世界政策》一書所闡述的國民帝國主義為參考準則，發展其國家力量與擴張殖民利益。而所謂國民帝國主義，是以國民的國家為基礎，與其國民之政治團體相抗衡，因而使其發展國家力量，以今日一般狀態而言，其勢力與其說是吞併土地，毋寧是為藉由商業擴張而擴大利益。<sup>7</sup>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在經濟上採行了資本主義體制，而產業上則開始施行近代工業生產。但是，當時的日本國是落後國家，在政治、經濟、產業上都無法與歐洲先進國家相提並論，因而採行得以發展產業政策、充實經濟之殖產興業政策。<sup>8</sup>為發展日本本國的經濟而開始推動振興產業，對於台灣或東亞各殖民地地區，是採取同樣手法，因此，在明治時代日本對台灣人施行義務教育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而實業教育在總督府的教育方針下得以大力發展，後藤新平便成為實業教育

---

藤時代，台灣總督府的鴉片收入，由最初的年收 164 萬日元，到多年後年收 443 萬日元，幾乎占了經常性年收的 15% 至 30%。參見黃昭堂，《台灣總督府》，教育社，1981 年，頁 75-76。

<sup>5</sup> 大園市藏，《現代台灣史》，日本殖民地批判社，1933 年，頁 485。

<sup>6</sup> 理想主義者木村匡教務課長認為在兒玉、後藤體制下所採行的是漸進主義、現實主義、利益主義，明顯違反現行教育體制及台灣殖民地政策的原則，後藤的教育方針主張對本島人只要施行初等義務教育，應是無法與其相容，據聞在後藤長官回絕下，木村教務長在職未滿一年，即於翌年三十四年二月離職。木村匡主張台灣教育統一主義台日內地，這與後者田總督所謂的「內地延長主義」內容略同，為國民教育之基礎，主張施行義務教育，相對於當時所採取是現實主義，木村主張的理想主義是當時一項宏觀壯舉。詳見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台灣日日新報，1927 年，頁 130。

<sup>7</sup> 《台灣教育會雜誌》第 28 號，明治 37 年 7 月 25 日，頁 3-4。

<sup>8</sup> 《產業教育八十年史》，文部省出版，1966 年 3 月 30 日，頁 5。

推行的教父。

在帝國利益考量下日本殖民台灣的實業教育係以勞動生產為主，除一般的農業、基礎工業、商業外，於 1919 年（大正八年）4 月 1 日頒佈台灣公立實業學校官制（勅令第 69 號）。其重要事項為隨著本島實業發展，依台灣教育令實施實業教育，教授學生生產技能，以有利於實業發展，並認同實業教育的精神，大正八年起，將工業學校與異名同質的工業講習所更名為工業學校，並於嘉義新設農林學校及台中新設商業學校，又因應需求而設立師範科，培養簡易實業學校教員，伴隨於此並設置附屬學校。<sup>9</sup>除此之外，實業教育在小、公學校制度中也有計畫性的推展，無論小學校的手工教育，或師範學校甲、乙科的手工教育，都是推展實業教育的一環。

依公學校之規則，雖決定設立農業及其他實業科，但在師範學校等也要求修習實業科。

（中略）師範部之事如前所述，是為謀求工藝部之發展，同時擴展農業和商業等，力圖

打破藐視實業之陋習。（中略）在高等學工藝部，雖獎勵實業教育，但現有之公學校設

立補習科或類似中學之設施，在臺北有教授農業和商業，在台中教授林業，根據當地

需求斟酌適宜情況施行實業教育，使畢業生全都得以成為對國家直接有用之人才。（以下省略）<sup>10</sup>

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於明治三十三年五月三日頒佈臺北縣農業事務實驗場規則（臺北縣令第 5 號），為輔助農業知識之普及，而決定舉行農事講習。<sup>11</sup>台灣的實業教育開始制度化，也開始了殖民地台灣之職工教育。這項政策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仍繼續沿用，是當今職業學校體系的起源。

兒玉、後藤時期積極開發台灣、提高生產力、重視實業教育等作為，得到了不同的評價，對日本帝國而言，貢獻國力奉示天皇政策，是正面方向，但對台灣而言是殘酷官僚。海老原治善所著《日本帝國主義教育政策史分析》對後藤新平有此評論：

<sup>9</sup> 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台灣日日新報，1927 年，頁 891。

<sup>10</sup> 《台灣教育會雜誌》第 28 號，1904 年，頁 6-7。

<sup>11</sup> 《台灣教育沿革誌》，台灣教育會編，青史社復刻版，1982 年，頁 872。

提倡「實業教育主義」。他沒有停滯討伐土匪、經營鴉片等消極性的事業上，而將重點放在必要性的「積極重要設施」，如鐵路建設、土地丈量等事業上。因而，採行實業教育主義成為必然。並且在初期武斷的政治手段之後，就像是「服用重藥後所必須施予之鎮靜劑般」。<sup>12</sup>

若將後藤新平與伊澤修二對臺灣的文化教育方針作一比較，其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後藤的「實業主義」雖然開始重視手工教育，但是僅止於將手工教育單純的視為產業手工、生產技巧。此「殖民利益主義」明顯地僅著重於大日本帝國之利益，並無以藝術為出發點之考量，而伊澤以「有用學術」的論點所開展的圖畫教育卻成為殖民地台灣美術運動之啟蒙。

## 二、實業政策的振興

後藤新平離開台灣之後，其在台之功績受到好評，成為統治台灣相關問題的諮詢對象。台灣第 6 任總督安東貞美上任後，請教過後藤關於統治台灣的方法，並希望後藤提出施政方針的建議。在「官制改正卑正見」中，後藤新平闡述了相當重要的意見：

對土人政策之確立，南洋關係之考究、設施的設置，以及蕃地之啟發和利用等，需策略得當，且符合天皇陛下之意願，處理這些關係國家百年大計的事務是總督閣下之任務。（中略）在此，至少施政方針中特別重要的產業政策確立與教育制度確立，產業興廢，是檢視台灣統治成敗用具，應獎勵並助長產業基礎確立，謀求產業事業發展，這是台灣總督府歷任總督施政大方針，如今台灣產業取得如此輝煌成績，每位提及台灣的人都為讚賞之事，此時無其他值得議論之處，全都認同總督府產業獎勵實況，務必繼續執行現有的產業政策（以下省略）。<sup>13</sup>

因此實業的推展是其重要政策。但日本對台灣的統治策略與歐美帝國主義基本上是相同的，對於殖民地人民的統治支配，均以殖民母國利益為主要目的，所以，日本在台灣所推行的實業政策，基本上仍以其利益為主要考量。此實業政策的推

<sup>12</sup> 海老原治善，《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三一書房，1965年，頁240。

<sup>13</sup> 後藤新平，《台灣民政長官時代》（12-4、大正5年5月10日），1916年，第795-800頁。

展，係以產業技術開發及養成之實業教育為主而展開，但其政策推行的主要目的並非以發展振興臺灣實業為主，而是一種殖產政策下的產物，旨在充分利用殖民地的勞動力，獲取經濟資源。

日本在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頒佈台灣總督府農事實驗場規則(訓令第 251 號)，雖然先後舉辦多場農事、林業和獸醫講習，也將農事講習細分成甲、乙兩科，但隨著公學校的普及和地方農業的發展，耕種及畜牧業方面人才的需求隨之增加，因此決定延長在學年限等措施，以求更完善施行教育以培養人才。但從明治四十四年所頒佈的訓令第 251 號第 9 條修課內容有修身、國語、漢語、數學、地理、歷史、博物、理化、農學、圖畫、體操、實習……等<sup>14</sup>即可窺探端倪，其中雖有圖畫教育課程，然亦顯露出日本對台灣的實業教育背後之最終目的，不是培養人民的美學涵養，而在於培養生產技能的人才所需，與美術文化範疇完全不相關。圖畫課程只限於手塗描寫、摹臨畫或簡易的素描課程，完全是配合農林、獸醫課程所需而設立的圖畫課。

而明治四十五年七月五日頒佈了民政部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規則(訓令第 153 號)，及台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學生培養規則(告示第 100 號)，清楚明定教授學生職工必要的知識和技能及修業年限(3 年)，而第 3 條規定：「本所之教學科目分為木工科和金工及電工科兩科，木工科分為木工及家具兩科；金工及電工科分為鑄工、鍛工、鉗工、皮金工和電工等五科，學生可選其中的一科作為專科學習，但所修專業必須符合學生之性格、體格、專長及其志願。」

15

但實業教育的振興和發展，是與台灣森林土地開發計畫同時進行，日本想藉由建設台灣殖民地中獲取利益，著力點已經相當清楚，所謂台灣大建設只是南進基地的幌子，藉嘉南平原的開發以獲取土地利用價值，取得更多的米糧以作為提供日本南進作戰的儲備糧倉，而台灣三大林場的伐木計畫以及理蕃政策，亦突顯日本帝國奪取台灣資源的企圖。

雖然日本人對台灣殖民地的產業開發係用總督府的殖產課進行各項調查，以運用台灣豐富的森林資源而開設台灣木材教育課程，卻啟動了台灣唯一的專業手工教育(木工)，亦間接開啟台灣殖民地職工學校的手工教育課程，是台灣殖民地教育最早的手工課，奠定殖民產業手工藝術發展的基礎。隨著戰後日本經濟復甦，對於傳統手工木雕刻、建築刻花裝飾用品的大量需求，台灣五、六〇年代手

<sup>14</sup> 後藤新平，《台灣民政長官時代》(12-4、大正 5 年 5 月 10 日)，1916 年，頁 881-882。

<sup>15</sup> 後藤新平，《台灣民政長官時代》(12-4、大正 5 年 5 月 10 日)，1916 年，頁 883-884。

工業因此相當興盛，大量生產外銷日本賺取外匯，可見當時手工教育已奠定深厚的基礎。

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內容及品質都極為低落，與日本國內的美術教育和產業教育之發展過程迥然不同。另外，台灣美術教育的手工教育，是融入產業振興及實業教育的體系，手工教育學者阿部七五三吉在他的著作《手工教育論》中，對手工教育及社會現象做了詳細的解釋：

當時的國民，無論是政治家、實業家或是教育家，都不約而同地主張學問獨立，工業獨立，這種呼聲一時之間相當高漲。結果，在實業界促進各種工業之興起，教育界則不斷強調創造教育之必要。<sup>16</sup>

文中顯示出當時日本社會對國家的整體發展寄予厚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教育者汪知亭針對日本人在台施行之實業教育，做了以下的批判：

他們（日本人）雖可以輕易控制實業補習學校，唯實業學校之設立相當嚴格，亦使其自始至終都很嚴謹。1.台灣人雖有進入實業學校學習的機會，但並不如日本人般容易。2.日本人配合了「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國家政策，因而，台灣人進入工業學校學習之機會極其稀少。<sup>17</sup>

### 三、殖民產業與手工教育

後藤新平在殖民地台灣推行的產業教育，從 1900 年（明治三十三年）起至 1919 年（大正八年）轉為實業官制，共持續施行二十年時間，殖民地台灣的經營開發，對日本政府有著相當的貢獻。但是，對台灣人的文化教育或是美術教育的內容，其教育政策卻是相當粗糙，實在無法與日本國內之美術教育相提並論。

日本國內至明治四〇年代以後，手工教育開始萌芽，且在政府全力支持下發展相當神速。到了大正時期以後，重視手工實刻的教育學程並和圖畫教育相輔相成，為當時學校教育的主流。出版業者在政府的鼓勵下編纂多元化教科書形成百家爭鳴景況，可謂非常活躍，是日本美術教育的全盛時期。步入昭和時期以後，自由手工、藝術手工及創作手工，<sup>18</sup>更使當時日本美術教育達到頂峰之際。反觀台灣的實業教育到 1919 年（大正八年）為止，完全掌控在日本殖民地官僚手中，殖民教育並非文明的、合理的平等教育。此時台灣的教育是一種新愚民政策，對於台灣美術發展沒有任何重大影響，手工教育本質僅止於殖產主義的變身。

<sup>16</sup> 山形寬，《日本美術史》，黎明書房，1967 年，頁 613。

<sup>17</sup> 汪知亭，《台灣教育史料新編第一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頁 75。

<sup>18</sup> 宮脇理，《新版・美術教科書的基礎知識》，建帛社，平成三年三月十五日，頁 22。

1925 年（大正十四年）後藤文夫總務長官在對地方首長訓示中再次強調，為滿足國家需求，手工教育等教育科目之重要性，其中有關勤勞教育有如下指示：

勤儉力行是做為人或國民最重要德性，自不待言。特別是日後本島的日益開發，期使能以為國運發展所用，作為我國民，更樂見其能精勤力行。近來，在本島（指台灣）學校教育上，已可見其漸次重視實習，在此精神層面上，是最令人感到可喜。把握此一時機，更積極予以指導和獎勵。以期在農業、商業、水產和手工等方面希望能再加強實習，振興重視勤勞的風氣。<sup>19</sup>

所述內容仍為後藤新平所留下的殖民地台灣殖產文化教育政策方向，是實務性的僅以國家利益為考量所執行的人工教育，對於台灣人民而言，也是利弊同時存在且令人困惑的教育政策。此種教育政策相較於日本的產業教育發展，在殖民地台灣初期教育是無聲且成功的被接受。台灣在不平等的嚴格法律約制的教育體制下，求學是相當困難的狀態，對於以開發殖民產業為優先考量之情況下，可想而知遑論會有手工藝術之存在。

初等教育的產業教育或許可視為手工教育。至明治中期為止，日本一直處在經濟不振的時期，從日俄戰爭前後開始急速增設教學科目。1907 年起六年義務教育施行也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是專職教師數量少，且設施、設備、材料費用等各方面明顯匱乏，而文部省的法令搖擺不定、不符學生及學校現狀等問題，致未能得到充份良好之效果。<sup>20</sup>人創造時代，時代改變人。日本殖民改造台灣，並引進文化教育事業制度，藉由改變台灣獲取統治暴利，卻反而奇蹟般開創了台灣的美術教育發展及近代台灣美術運動的前奏。三星靜於《台灣教育雜誌》第 77 期（明治四十一年）〈關於藝術教育〉一文中強調了台灣美術教育之重要性：

首先，應圖國力之充實，為使國力充實之第一要務，就是振興實業。（中略）其二，以社會經濟而言，國民藝術教育之興盛，可以提升該國在自然、趣味方面之高尚品味，則工藝製品上，相對於其他國家，也從而得以獲至優越地位。因此，藝術教育一方面可以挽回國民道德之墮落，另一方面，得以為給該國帶來經濟上之支援，教育主義之理想與實際薰陶之調和，此意義上，也足以肯定藝術教育之必要性。

應屬藝術教育範疇之學科有圖畫、手工、音樂、文學。（中略）在總督府

<sup>19</sup> 後藤文夫，《後藤總務長官於地方長官會議之訓示》，總督府，大正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頁 11。

<sup>20</sup> 土屋忠雄、渡辺晶、木下法也，《概說近代教育史》，川島書店，1967 年 10 月 10 日，頁 77。



開展之手工講習會，也可謂是跨出了藝術教育發展的第一步，以此，日後可提高我國民之興趣，防止物質生活之墮落，得以營造健全的社會生活。

(以下省略)<sup>21</sup>

在本文中，日本在統治台灣的明治年間，對於殖民地台灣的教育意見有著較為特殊之論點，可以下列兩點加以規制：第一點是藝術教育調和人民生活，才能提升台灣殖民地的粗俗教育品質與社會文化之統治。第二點是藉由實業教育得以充實國家主義，並發展殖民地之物質文明。山本鼎於其著作《自由畫運動》中關於「手工教育和產業美術」，闡述了美術教育之藝術趣味的普及與實業教育之創造價值兩者之間有其特殊相互關連性。

#### 四、山本鼎對台灣手工教育之影響

山本鼎，在 1919 年（大正八年）設立農民美術練習所，1920 年（大正九年）設立了「日本兒童自由畫協會」，宣揚自由畫運動。翌年創辦了《藝術自由教育》雜誌，並將「日本兒童自由協會」改為「日本自由教育協會」，並在日本全國熱烈展開，鼓勵學生至戶外寫生，一時間引起廣大的迴響，可惜未能長期持續，而至 1925 年（大正十四年）終於宣告自由畫運動失敗，並解散協會以示負責。<sup>22</sup>岸田劉生對於初期的自由畫運動有著如此評述：「所謂自由畫，是不干涉兒童思考，依其感受所畫，是心靈及感性之表現」。<sup>23</sup>在日本，自由畫運動經由多數藝術家宣揚而帶來其振興效果。在台灣美術教育的發展過程中，自由畫也曾短暫得到發展，算是殖產文化教育中的一段插曲。

1921 年（大正十年），台灣新聞社創刊 20 周年紀念，在台北、台中、高雄、台南、嘉義、新竹、基隆等地展開了小、公學校及蕃童自由畫教育展覽會，<sup>24</sup>點燃自由的烈燄，山本鼎主張自由畫教育和自由畫運動相互呼應，當時受到了日本新聞媒體的關注，朝日新聞社主辦了世界兒童自由畫展，東京日日新聞社則對日本兒童自由畫展覽會提供了資金的援助，同時定期舉辦自由畫展覽會及演講會等，使自由畫運動得以成形，對美術界之權威人士、政府及教育界提出了改革教條式刻板教科書的呼籲。

<sup>21</sup> 三星靜，〈關於藝術教育〉，《台灣教育雜誌》第 77 期，明治四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頁 2-3。

<sup>22</sup> 《大正時期的美術教育特論（自由畫教育運動）》，東京學藝大學村內哲二講座資料編，1987 年。

<sup>23</sup> 《大正時期的美術教育特論（自由畫教育運動）》，東京學藝大學村內哲二講座資料編，1987 年。

<sup>24</sup> 《台灣新聞社》（漢文），1921 年 4 月 5 日。

當自由畫運動盛行於日本國內時，1923年（大正十二年）10月31日，為推進日本與外國間的相互研究，故而申請由臺北州教育會於旭小學校展開台灣全島公、小學校、中學校之自由畫教育成果展覽會。由11月4日起，會場轉至新竹尋常高等學校，塩月桃甫針對主題進行演說及對作品進行講評，此重大成果之展出得到大家廣泛的注意，全島公、小學校進而掀起自由畫創作的風潮。<sup>25</sup>1924年（大正十三年），山本鼎受農商務省的委託而在4月份探訪台灣，視察台灣的手工藝及排灣族之雕刻。同時，應台灣教育會邀請，以美術與工藝為題，進行5次演講。演講盛況空前，美術產業和自由畫運動於此再現高峰。<sup>26</sup>

第一次演講是5月1日，在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現臺大醫學院）禮堂舉行，講題為「美術教育之觀點」。第二次演講是以「產業美術和手工教育」為題，對學校教師專題演講，沒有開放給一般大眾及學生們。第三次演講是在國語附屬小學的禮堂，以「家庭手工與圖案」為題，開放給一般婦女及高學年之女學生。第四次和第五次演講會場則轉至總督府廳舍。第四次演講是以殖產局職員為對象，主講有關「台灣工藝產業」。最後一次是以「台灣的產業美術」為題，採自由參加開放式演講。<sup>27</sup>在台灣教育會悉心計劃安排下，以自由畫運動之先驅——山本鼎為焦點的台灣報社大舉報導了演講會的盛大空前，特別是第一次的演講「美術教育之觀點」，對從事美術教育者而言有著相當重大的意義，也是台灣美術界的重大事件。山本鼎在台灣停留的一個月期間，對台灣的手工藝及原住民雕刻進行了研究，並在《台灣日日新報》上陸續發表了〈展望台灣工藝產業〉的文章。其中，將台灣的工藝分為「產業工藝」、「自用工藝」、「純工藝」等，並進行分析和探討，內容非常精彩。並於4月29日和30日兩天，在總督府廳舍內舉辦展覽會，展示阿爾卑斯式人偶、設計模型、原住民模型和利用廢棄物製成之作品等，是配合演講主題所舉辦的展覽。山本鼎回國後，將在台灣期間調查時之見聞整理歸納為〈排灣族的雕刻〉一文，發表於美術雜誌《畫室》上。<sup>28</sup>

山本鼎在促進版畫藝術發展同時，並致力於農民美術的推展與普及，設立了農民美術練習所，發表農民的手工藝品，努力啟發農民意識，獲得了重大成果。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各種學說的自由爭論不斷地發展，藝術富國論主導日本社會，彷彿就像是文藝復興般地展開。除繪畫、版畫、兒童美術教育之外，還有各

<sup>25</sup> 《台灣日日新報》，1923年10月31日。

<sup>26</sup> 《台灣日日新報》，1924年4月30日。

<sup>27</sup> 《台灣日日新報》，（漢文）1924年5月4日。

<sup>28</sup> 山本鼎，〈排灣族的雕刻〉，《畫室》（Atelier）6月號，1924年。

種參考書籍從國外湧入國內。<sup>29</sup>尤其是創作手工教育迅速發展，也開始受到當局的重視，對台灣的美術教育的變遷有重大的影響及作用。台灣原本的手工藝即已非常發達，傳統的雕刻藝術是台灣寶貴的文化資產，日本人統治台灣後，投入大量的資金，計劃性地展開調查和研究，同時，在國語學校設置手工科，並且每年不斷在全島的公、小學校之師範體系及其他學制教育中增設手工科，《台灣時報》曾有以下報導：「至 1923 年（大正十二年）初，學校數有近 800 所，含專科學校之中學校有 23 所，入學兒童人數達 24 萬人。」<sup>30</sup>台灣初等教育的發展，對兒童美術教育有極大之助益，山本鼎所倡導的自由畫運動不僅對內地，甚至影響到台灣兒童教育課程。雖然台灣的殖民教育體系受到許多的約制，自由畫運動無法持續很久，但受到這股旋風之襲捲所掀起的浪潮，推動了自由風氣的誕生。

在殖產產業、近代產業振興的工業化政策的基礎上，積極開展明治十年的內國勸業博覽會，獎勵與「書畫」完全不同之美術工藝，至此，可知美術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政策轉變。美術已經與物質產業劃清界線，被歸類為以精神文化財產為內容的「美術藝術」(Fine Art)，這也是近代對美術的狹義定義。<sup>31</sup>

在殖民地台灣的教育改革過程中，共舉辦過 16 次台灣美術展覽會，雖然區分為東洋畫和西洋畫兩個部份，但試著相較於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美術展覽會，台灣美術展覽會只是插花型的模式，毫無新意，平凡如潛水艇默默潛航。相較之下，朝鮮人民展現強大積極的民族反抗力量，創造出超越日本帝國所能控制的朝鮮美術，而台灣的美術展覽會竟只是東、西洋繪畫互相觀摩，猶如陳年醬油，初期當中或許仍有生機萬重山，然而歷經十年以後，雖將台展提升為府展的層次，內容依舊絲毫不變，恍如醬缸裡的剩菜。參照 1932 年（昭和七年）的第 11 次朝鮮展覽會之際，其進行了規程之修訂，將第 3 部的書、四君子廢除，並添加新的工藝品部別。四君子涵括在第 1 部別的東洋畫中，而書畫是另行尋找其他適當的獎勵方法，雕刻因成品不多及經費問題之故而暫時中止。修訂的主要理由是「有鑑於近來形成趨勢的民藝，或鄉土藝術愛好之發展，又為發揮朝鮮固有工藝的精華，有此緣由而加以修訂」。<sup>32</sup>

相對之下，殖民地台灣的手工藝與朝鮮美術展覽會之工藝有極大差異。台灣產業手工為學制控制下之殖產文化的低俗產物，正如以兒玉、後藤體制代表的

<sup>29</sup> 村內哲二，《明治中期的美術教育》，國粹保存論時代之美術教育、東京學藝大學講座資料編，1976 年。

<sup>30</sup> 《台灣時報》第 39 期，1923 年 12 月。

<sup>31</sup> 《京都教育大學紀要 A（人文・社會）》，京都教育大學，1989 年 9 月 30 日，頁 260。

<sup>32</sup> 《京都教育大學紀要 A（人文・社會）》，京都教育大學，1989 年 9 月 30 日，頁 266。

日本近代重要政治人物並沒有特別重視台灣的文化特質所導致之結果。山本鼎就闡述如下「政客是因看見了創造性勞動起點與其附加價值所帶動的概念，故而聲援之，但藝術家則是以珍視原始的創意和技巧，政客即使對農民美術稍有留意，但極少會因此懷使命感進行創業改革，毋寧說是，展現出其不樂見庶民藝術產生的表徵吧。」。<sup>33</sup>日本人在台灣推展殖民地政策，在追求個人抱負及國家利益之下，殖民地台灣的實業教育當中的手工藝術以其具有重要意義而被保留下來，在此重要的是兒玉、後藤究竟有何收穫？他們的利益重心何在？相對之下，對殖民地人民而言，在異族治之下要得到平等及尊重，何其困難，如何以自身努力創造自身文化，才是為重要的部份。誠如山本鼎所言，兒玉、後藤體制所創造出來的殖業手工教育政策下的產物若只被當成粗俗品的話，那麼他們二位的貢獻應該當仁不讓才是。

## 五、小結

本文重新省思台灣殖民地的教育史，尤其是近代殖民地歷史當中幾乎已被遺忘的學校美術教育沿革，列舉批評殖民地台灣美術教育之意義，也對於日本統治時期日本人長時間研究殖民地台灣美術教育之特質及其本質，加以論述。

雖然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長達半個世紀之久，但日本政府對台灣殖民地進行開發，系統化推行殖民地教育，使其邁向近代化的發展，並確立了殖民地教育制度的事實無可否認。初期在教育家伊澤修二的領導下，制定殖民地台灣的教育體制，採嚴格與懷柔並濟的「混合主義」，亦即日語及漢語並存的妥協主義學制。在台灣成功施行西式新學制、美術教育及手工教育，打開台灣近代西洋美術之門的同時，也再度審視東洋美術的價值。

台灣美術教育初期的手工教育，是後藤新平利益主義下的教育政策，後藤新平離開台灣以後的學制教育，則開始傾向於殖民地的產業開發。因為特別重視手工產業，導致其成為「重視生活技能」的勤勞教育，手工教育在利益主義驅使下，喪失創作意義的同時，其藝術性也隨之降低。又因重視商業利益，故而大正以後的台灣手工教育，即使從傳統手工藝教育的觀點而言，也不可避免的陷入低迷狀態，後來因山本鼎的訪台，使得手工藝術教育的重要性再次被審視，山本鼎強調生活上必要價值以及技巧運用應受到肯定，手工教育不應只限發展成手工產業及純手工教育，而需加入藝術原創等美感意志，他的觀點對台灣初等教育兒童美術

---

<sup>33</sup> 山本鼎，《自由畫教育》，ARS 出版，大正十年，頁 29。

教育課程有其重要的影響。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